

章启群 主编

北大美学  
研究丛书  
(第二辑)

# 康德共通感 理论研究

周黄正蜜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北大美学  
研究丛书  
章启群 主编  
(第二辑)

# 康德共通感 理论研究

周黄正蜜 著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德共通感理论研究 / 周黃正蜜著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8  
(北大美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5630-1

I. ①康… II. ①周… III. ①康德 (Kant, Immanuel  
1724—1804)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 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756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北大美学研究丛书  
康德共通感理论研究

周黃正蜜 著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630 - 1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3/4

定价：22.00 元

Zhouhuang Zhengmi

**Der sensus communis bei Kant**

© Walter de Gruyter GmbH Berlin Bosto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work may not be translated or copied in whole or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 Walter De Gruyter GmbH,  
Genthiner Straße 13, 10785 Berlin, Germany ) .*

## 主编寄语

三“木”成“森”，三“人”成“众”，三“火”为“焱”。在这套丛书的第三辑即将面世的时候，我觉得再继续“潜水”，不说几句话，实在有愧于作者，也有与读者躲猫猫的嫌疑。

用现代汉语言说和写作美学的历史，与北京大学具有血肉之关联。中国大学开出第一堂美学课在北大，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美学著作的作者在北大，几乎所有现代中国美学巨匠都在北大。北大培养的美学专门人才，是中国任何大学科研院所的数倍之多。北大出版的美学著述及其影响，中国的任何其他学校、单位难以望其项背。细细罗列这样的辉煌，似乎不需多费力气，亦难以尽言。而有幸进入北大研习美学者，受前辈精神之熏染，得大师思想之滋养，寸草春晖，岂敢言报恩于万一！然献曝之忱终不能绝，况学术之薪火相传，不能截断于吾辈，故尔有本丛书之面世。

丛书第一辑和第二辑分别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辑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现象大概只能用缘分来解释。我自 1993 年以来没有申报任何国家科研项目。在没有任何政府和个人资助的情况下，这套丛书至今将出版三辑共 13 本，在某种程度上亦验证了我的信念。因为我坚信，21 世纪的中国，在任何情况下，纯粹学术一定能够找到适当的土壤，得以生存和发展。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有新科学、新技术，还要有新文化、新学术。为这个信念而做出的坚守，其意义甚至比学术本

身更大。

《淮南鸿烈》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使用汉字是个极为神圣的事业。中国民间千年来素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我辈假学术之名，操三寸之管，下笔千言，惟祈戒甚慎甚。然学养功力毕竟有限，期盼天下方家不吝示教。念兹在兹，是祷是祝！

章启群

戊戌正月廿一，岁次 2018 年 3 月 8 日

# 周黄正蜜书序

韩水法

自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康德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在这个进步中海外学成归来的年轻学者正在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康德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事业，这些海外归来的学者不仅带回了国际康德研究的最新文献、方法和关注的问题，也带回了他们的成果；通过邀请他们的导师和老师来华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拓展和强化了中国康德学界与国际康德学界的联系和交流。他们开设康德研究课程，积极参与和组织国内康德研究的工作坊和会议，促使康德研究向各个不同的方向深化。

周黄正蜜就是这样一名优秀的青年学者，而这本《康德共通感理论研究》就是她在德国几年艰苦研究的出色成果。此书的德文版已经收入《康德研究增刊丛书》(Kant-Studien. Ergänzungshefte)<sup>①</sup>，自这个丛书 1906 年出版至今，周著是收入丛书的第一本中国人著作。无疑，这是一项值得称赞和庆贺的学术荣誉。现在，此书的中文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汉语读者带来康德研究的新消息。

本书脱胎于周黄正蜜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是康德的共通感理论。初读之下，周黄正蜜的研究令人觉得相当专业而规范，全面而

---

<sup>①</sup> 这是重要哲学杂志《康德研究》所主编的一套康德研究著作丛书。

详细，在思路、方法和文献等方面都颇具新意。

在康德理论中，共通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它之所以困难，主要出于如下三个原因。第一，共通感是康德理论体系之中难以界定的学说。这个可溯源至古希腊哲学的观念流传至近代成为一个在哲学、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皆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明其所以的基础性的理智，其概念由拉丁文、英文而至德文形成了一个概念簇，在许多文本里它们是可以彼此替换同义词，而在一些语境中它们却各有特殊的意义。综观之下，康德在其著作中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他只是直接把它们拿来使用了，诚然，有时是对照中使用的。这一点周黄正蜜在其研究提到了。第二，共通感与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所分别批判的三种高级能力之间的关系，在康德的文本中亦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明，尽管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讨论中，康德常常用这簇概念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与纯粹知性或理性的先天形式进行对比，以突出前者的普遍而必然的性质；在《逻辑学讲义》，这样的对比也经常出现。但是，这样的对比在意义上常常卷入甚至更不清晰的表达。同时，共通感与感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康德也没有给出清楚的说明。第三，康德对共通感的理解和态度在他的理论里经历了变化。在批判哲学的前期，亦即在他着重从事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研究的时期，他将共通感视为泛指的普遍理性，而这虽然是批判的出发点，但不是批判的对象。并且，就如我们所了解的康德对经验主义哲学的态度，他对这个在当时显得极具英国经验论色彩的概念相当警惕，如果不是完全拒斥的话。

显然，研究康德的共通感，就不仅要面对而且要着手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梳理康德所揭示和所发现的各种理性能力：划分理性各种能力的不同层次和功能，确立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澄清某些晦暗不明的部分，并标明那些实在无法说明的内容。在这类前提和基础的工作之上，共通感与理性这些能力的关系才有得到澄清和确定的可能性，共通感的位置和性质也就能够刻画或至少勾勒出来。自然，这是对研究的一种理想的描述，实际的研究必定有其进程的特殊性。

周黄正蜜的著作是对康德共通感的系统研究，在方法上，它采用了两个结构来处理上述的综合性问题，并将整个研究贯穿起来。第一个结构就是本书的纵向组织，即依照康德三个批判的顺序来分析共通感在这三个范围的不同意义和作用，以及这簇概念及其意义的演化。它也构成了本书论述的主要次序。第二个结构就是主体际与主体内的功能，它们构成这个研究的横向纲要。这一结构看起来是作者参照现代哲学自己分析和建立起来的。在作者看来，共通感在每个认识、道德和审美三个领域都发挥着这样的作用。不过，在实际的论述中，只是在著作的最后部分作者才明确地拎出这条线索。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此书的所有其他材料都被组织进这两个结构里面，而相应的分析和论证在很大的程度上就要用来支持这两个结构。

这两个结构的前一个在于告诉读者本书的论述范围，而后者则给出了理解共通感功能的两个向度，有如参观名胜古迹的指导线路，为理解康德的共通感提供了一个专门的维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具体地来检视本书结尾处的一个综合性的表格，这是作者在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言中高级能力表基础上设计的一个更加综合和全面的表格，尝试从与共通感的关系这一角度着眼将所有的高级能力和低级能力及其应用都按照一定的领域分类和排列起来。这个表格可以这样来理解，作者向人们展现了在上述两个结构之下所要和所

能理解和把握到的康德共通感学说所包含和所关涉的主要的内容和层面。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有益和原创的想法，诚然，它也相当困难而有风险。

康德的批判哲学首先以系统的形式揭示了人类理性能力多维的活动方式和结构特征。相对而言，理论理性范围内各种能力之间的功能和结构的关系最为复杂，先天综合判断是理性各种能力之中纯粹形式最为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共同作用的样式。在这个样式中，感性与知性能力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不是平面的，也没有时间上的次序，而是以格式塔样式同时发生作用。实践理性的作用也是如此。看似简单的意志的自由决定，实际上要以多种其他能力、形式和活动为前提和条件，并且其他能力和形式也会一并发生作用，如道德情感。

人们理解和研究康德理论的困难多半来自于难以把握和处理这种多维功能的并行活动。在认识论和心理学领域，康德早就被人们确立为格式塔理论的创始人，因此，人们应当反问，格式塔的认知方式可能是线性的和平面的吗？当然不是。在《判断力批判》的起首，康德分析和讨论的重点是理性在自然和自由两个领域相互过渡的问题，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就关涉如何处理适用于不同对象的不同理性能力彼此重叠、交叉地发生作用这样一些现象。事实上，正是由于理性这样多维的作用，自然的存在才会分别被构造为认识的对象、审美的对象和道德的对象。当三个批判的原理被综合起来考虑的时候，这种关系的性质就显现得更加清楚和明白了。简单地说，人类理性是在四维——就如康德反复强调的那样，时间在这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内在条件——的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尽管康德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深受牛顿理论的影响，但是，人们必须清楚

地认识到，康德哲学的方法论原则乃是解决一切实际地出现的问题，这样，牛顿的理论和观念或许会影响康德的思路和方式，然而解决问题的宗旨又会促使康德突破这类限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康德理论的结构中清楚地看到。

因此，我们可以想到，康德的三个批判就揭示了一个当时他所能发现并证明的理性立体的或四维的结构的最主要內容，这些结构的形式、它们的功能、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通过这样的结构而获得的各种结果，如认识的、审美的和道德的对象。

当我们也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周著的那个表格时，那么我们的思路当然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由表格的纵列横行所表示的关系，也可以考虑它们之间的斜向的关系，这样，一种多维的关系和结构就露出了端倪。

这张内容颇富的表格里，作者用四个领域来安置共通感和由其衍生出来的若干概念，以及作者自己概括出来的概念。如果从上述的多维的和立体的角度来考察，那么，这张表格在分类及其根据等方面就需要完善和调整，这就是说，作者需要为每一项表格的概念和内容提供必要的理由和说明。而这种理由就包括其中每一项与其他一项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些不同的领域、功能和其他项目，结合康德的自然和自由的两大领域、三个批判，以及作者最后挑出的主体间和主体内两个向度的关系来考察，都指向一个更为广阔和基础的理智世界，这就是共通感，一个需要从多种角度来考察从而获得更清晰的理解的人类一般能力。

这样，当人们从一种新的角度，以一种新的方法来考察共通感时，实际上也就是揭示了这个现象及其概念的新的关系。从西方哲学史和观念史上来看，共通感的思想不仅有其悠久的历史，亦在

经由不同哲学的发现和诠释之后积累了丰富且也可能相互矛盾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中的最主要部分，就如作者简要的论述，体现在了康德的共通感思想之中。不过，康德对共通感的思想和概念的态度在他的个人思想史上是有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体现了它的不同意义在康德理论中的不同展现，或者用一种较具思辨性的说法，是逐渐展开的。

在我看来，康德的共通感思想亦可以主要地概括为前后两种观点。第一，在早期，尤其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领域内，它指那些经验性的、未经批判的人的一般理智能力（*understanding*）。在欧洲近代哲学中，这样的理解是广泛流行的，但是哲学家们的努力正是要超出这种一般的理解。需要指出是，康德对共通感的理解受到英国哲学的影响。在近代英国，尤其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共通感的思想无论在为人的认识和道德提供一般的基础，还是为政治的和民族的认同提供共同的根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无可避免的经验主义的色彩使康德对它持谨慎而远之的态度。

第二，它指人的一种最为广泛和一般的能力，或者如周著所称的那样，智性能力，而我更愿意采取一个习惯的用法，一般的理智。共通感就是指示这样一个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的能力。它关涉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在《判断力批判》等晚期著作里，对这样一个比广义的理性更宽广的概念，康德近乎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因为在这个时期他试图为所有的先天的理性形式——它们仅仅是人类理智能力的一部分——寻找一个共同的基础，而这是它们彼此之间能够协作和共同作用的条件。康德的这个做法，当然冒着沾染某种经验主义色彩的危险。此外，除了认识、道德和审美的活动以及它们彼此的协作之外，尚有许多其他事情需要理智来处理，而按照康德的思

路，处理这些事情的能力在其先天的形式发现之前，它们就安身于共通感之中。

周著赋予康德的共通感的两种作用即主体际和主体内，前者无疑是现代的，而主体内这一层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不过，我们看到，在《判断力批判》40节有关共通感的论述中，康德提到的三种思想方式就包含了做出这样两种向度的诠释的基础。

当然，周著的分析和论证将这样两个维度清楚地揭示了出来，而其前提就是专业的文献考证和文本分析。比如，我们看到，本书中有关道德感与共通感之间关系的结论建立在对与实践（道德）共通感相近的诸多概念仔细的考察和辨析之上。综观整个研究，作者有效地利用了康德的手稿、讲课记录等文献，这些文本为理解康德的概念，尤其是康德学说中那些模糊、依违不定的概念和表述提供了关键的参考和线索，它为追踪康德思维过程中的实际轨迹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就此而论，在国内的康德研究界，这还是一个少有人重视的方面，国内大学训练出来的学者多数并不怎么重视康德全集第十二卷及以下的文字，其中的原因当然也包括语言的障碍。

无疑，这本著作还存在若干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作者为采用实践共通感而非道德共通感的概念提出的理由，在我看来似乎刚好支持了相反的选择。另外，作者忽略了一处可以用来支持其实践共通感的文本细节，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提到了“纪律的共通感”（参见 AA, VII 329）。

康德哲学研究，二百多年来，文献汗牛充栋，名家辈出，至今依然为显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认真而深入的研究往往成为非常有效的哲学方法论的训练，而方法论的实质就在于理论

的构造。这也就是康德申明《纯粹理性批判》首先就是一部方法论著作的意义，尽管人们的确常常忽略这一点。

康德哲学结构宏大而谨严，分析深入而条理分明——这些都来自于对于问题的深切而周全的思考。康德研究既是哲学方法论的训练，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仅仅对那些努力获得新的观念和见解的人来说才是如此。在康德哲学中，几乎每一个重要概念——一个重要的概念就蕴涵一个学说——在其理论中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与其他的重要概念和理论的主要部分都有明确的关系，即使通过中介环节，最终也能够勾勒出这样的联系。这样的概念有大有小，有些概念主要关涉康德某个批判的某个部分，在特定的篇章和理论里就是清楚的，而有些或许就要牵涉整个哲学体系。共通感就属于后一种概念。

或许在这里值得提及的一点是，康德哲学有一个鲜明而重要的特征：所有重要的概念都具有多层意义，这些意义不仅依赖于具体的语境和文本，亦依赖于对康德哲学整个体系的理解。因此，人们可以概括出某一个概念的几层意思，亦可以依据具体的文本确定在这个语境下的特定意义，但最终确定它们究竟包含几层意义，则还需要参照整个理论体系。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但在研究中要将这一点付诸落实，则需要艰苦的工作。

在《判断力批判》40节中，共通感与启蒙紧密地关联在了一起，早些年，我自己从这些文本入手，考察了康德启蒙思想中被人忽视的第三层意义，而这第三层意义与康德对共通感学说的态度的转变具有莫大的干系（见《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这无疑为理解康德启蒙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而在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启蒙也是理解共通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最后，我要略微评价一下这本著作的作者本人。周黄正蜜在武汉大学本科学习时热爱哲学，从法学专业转入哲学专业，尔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专业硕士。在进入北大学习之后，周黄正蜜的学术兴趣日益浓厚，关注的重心集中到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上面。2008年她以优秀成绩获得德国“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资助，到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她强烈的上进心、长期坚持的毅力，以及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批判性的思考方式，乃是她得以完成这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原因，也是她将来学术上取得更大成绩的原动力。

2016年8月5日写于北京圆明园东听风阁

## 自序

本书处理了在康德哲学研究传统中一直被忽视、但最近却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和重视的两个议题——与理性相对的感性和与主体性相对的主体间性，对共通感概念在康德全部著作中含义与功能的系统性整理，突显和提升了此概念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本书将展示：在康德哲学中感性如何一方面通过被动性和经验性服务于理性，另一方面诱使理性犯错；主体间性如何一方面在先验层面被排除在主体哲学之外，另一方面在经验层面上对主体性建构和人道的培养不可或缺。在康德的独特建构中共通感概念不仅包含了感性和理性，而且连接了先天与后天、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这种勾连性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共通感的第一和第二种类型的共通感（认知共通感和实践共通感），而且集中体现在第三种类型——审美共通感上，后者贯穿了康德哲学的三个领域——认知、道德和审美。

本书的德语初稿于 2013 年被德国慕尼黑大学接受为博士论文，随后两年作者对书稿进行了修订和翻译，德文修订稿 “Der sensus communis bei Kant. Zwischen Erkenntnis, Moralität und Schönheit” 已由德古意特（De Gruyter）出版社收入《康德研究增刊》（Kant-Studien. Ergänzungshefte）系列丛书于 2016 年 2 月出版，本书为前者的中文译本。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君特·策勒（Günter Zöller）教授，感谢他无数富有启发的谈话、诸多细致的帮助以及一直以来

的耐心和鼓励。没有他的指导和帮助我无法完成这篇论著。我的硕士导师韩水法教授从我硕士阶段起就一直在专业知识和治学方法上给予我有益的指导，由此获得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奠定了本书写作的基础和框架，为此我非常感激。我要衷心感谢从本科时起就教授我康德哲学并不断对我的理解和写作提供有益批判和建议的邓晓芒教授。章启群教授在我博士后阶段所给予的指导深化了我对美学的认识，并将我的论著收入了他主编的《北大美学研究丛书》，我真诚致谢。莱勒·谢弗（Rainer Schäfer）教授认真阅读和修改了我的德文书稿，与他的谈话经常能启发我对哲学问题的原初和直接的思考，我十分感激。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资助，特此致谢。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周方锴和母亲黄彩珍。

2015年12月于北京